

## 宋代類書中草木花果類敘述的演變\*

姚政志\*\*

本文之主旨在論述《太平御覽》、《事物紀原》、《錦繡萬花谷》、《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和《全芳備祖集》等五部分別編成於北宋和南宋的類書中有關草木花果的記載。類書的起源雖然甚早，然而，到了宋代，不論是數量或是所針對的功能性，都較前代更加發達，開啟了類書發展的新時代，也表現出不同以往的知識分類體系。在《太平御覽》、《太平廣記》、《冊府元龜》和《文苑英華》等四大官修類書成卷之後，宋代類書的編纂權便落到了士大夫的手中。士大夫所

---

\* 本文得二位匿名審查人提供之保貴建議，在此表示由衷之感謝，全然接受。然礙於本刊篇幅之限制，不可殫改。唯另為專文，方可解決尚未完成之問題，尚祈見諒。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研究部博士班研究生。



編的類書，除了以科舉考試相關的知識為主要內容外，也蘊含當代主流思想的內容。稍早的宋代類書大體上是依循《太平御覽》的模式來記錄草木花果類的內容，到了南宋末年，開始發生變化。「理學」的取得了當代學術思想的主流地，也影響了類書的書寫。南宋末年的類書編纂者，在編寫動植物的內容時，運用了「格物」的概念。朱熹對《大學》中「格物」一詞的新解，原來是要在自然界的萬事萬物中發現「理」，進而提升個人的道德修養。類書的編者將之加以應用，仔細地描述各種草木花果的名稱、形狀、來源和變化，發展出元明以後，用「格物」來收編知識、討論知識的傳統。

關鍵詞：類書、草木花果、理學、格物、科舉、知識



## 一、前言

「類書」是中國古代，一種將各種文類分類輯纂的文書，甚具「資料匯編」之性質。雖然有學者視之有如現代的「百科全書」，但是其保留原始材料之特點，又是百科全書所不及。有關類書的起源，眾說紛云，有說戰國(453BCE-221BCE)末年雜家的著述是類書所托之始，其代表是《呂氏春秋》；亦有人言明標類目，分別部居的《爾雅》才是類書的發端；而有人則堅持魏文帝曹丕(187-226)召集群儒所編的《皇覽》才是類書「實體」的開始。類書成爲中國圖書類目中之一類，則可追溯到《新唐書·藝文志》，以後的正史、《四庫全書總目》等目錄編纂者，均採用了「類書」一詞來指稱這些充滿了材料分類編纂的書類。<sup>1</sup>

《新唐書·藝文志》載錄的類書共有五十五種，從《皇覽》始，而以《戚苑英華》終，其中大多數的文本今已不傳，可見者已不多。我們從《四庫全書總目》、《續修四庫全書》和《四庫存目叢書》中可見最早的類書，僅可溯至晉朝而已。考察《四庫全書總目》中著錄的存目書目、《四庫全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和《續修四庫全書》的結果，可以知道這幾種漢學研究的重要文庫中所收錄的類書，在唐代以前共有 19 種，宋代有 81 種，元代有 19 種，明代有 256 種，清代有 51 種，不明斷代的則有 3 種(見表 1)。換言之，我們要作宋代以後的類書研究，材料是相當豐富的。而不只如此而已，若再加上那些不被收在上述叢書中的類書，則材料是更

---

<sup>1</sup> 胡道靜，《中國古代的類書》(北京：中華書局，2005)，1-11。



加的充足。

表1：《四庫全書》系列中「類書類」所收書統計表

	四庫全書	四庫總目存目	四庫存目叢書	續修四庫全書	總計
唐代以前	9	4	2	4	19
宋代	29	25	14	13	81
元代	3	6	5	5	19
明代	13	127	103	13	256
清代	11	0	28	12	51
時代不明			1	2	3

本表據《四庫全書總目》、《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和《續修四庫全書》製成。

本文以宋代類書作為主要探討的材料。宋代是近世中國類書蓬勃發展的時代。其促成者，除了科舉制定的定型而造就許多的文人，讓他們在準備科考之餘，也有機會編纂類書之外，印刷術的發展和印刷品的流通，也使得類書的流傳和使用更廣。這樣的趨勢一直延續到明朝而不墜。而也就是在這樣的潮流中，類書的總類和訴求的對象也愈來愈傾多元化。

《新唐書·藝文志》所收錄的類書，有官修和私修二種。宋初編纂的《太平御覽》和《冊府元龜》即屬於官修類書的性質。宋太宗朝時(976-997)，結束了五代十國分裂的局面，正式開始混一統治，乃召集儒臣，徵集書籍，編輯了《太平御覽》和《太平廣記》等書；真宗朝(997-1022)，修改了《太平御覽》的編輯方式，由群臣撰成了《冊府元龜》。這二部官修的類書，論實用性，《太平御覽》不及《冊府元龜》，但卻代表了宋朝的二個不同



的政治氣氛。前者象徵著南北政治的、文化的統一，而皇帝成了整合南北官僚的領袖；後者作為施政指導的參考來說，是至高無上之皇權、官僚政治貫徹之表現。兩者充滿了政治意義。<sup>2</sup>除此之外，宋朝的類書鮮少官修，私修的類書才是宋朝類書界的要角。

宋朝的私修類書，和科舉脫離不了關係。科舉考試的擴張和定型，使得和考試相關的文類大量增加。學校裡的教師將和科舉考試有關的古典經義、時政範文、制度沿革和為官須知等分類編輯，講授那些埋頭科考的試子們。而到了道學大行其道的時候，講究道學的學者們亦將他們的道德和哲學理念分別納入到類書裡，逐漸使之成為士大夫們的共同價值。伴隨著印刷術的發展，試子們的需求和印刷工坊的供給，讓這些類書傳遍了文人所在的每個角落。<sup>3</sup>也由於科舉和印刷術的相互關係，越來越多的人投入類書的編輯工作，並且發展出不同類型的類書。日本學者指稱的「日用類書」<sup>4</sup>就在南宋時代現其端倪，歷經元代，至明代而達其高潮。

類書在宋代的變化，讓我們更能夠從各類書的編排結構去窺探當時的編輯者們對知識的組織和想像。前述《太平御覽》和《冊府元龜》，除了

---

<sup>2</sup> Johannes L. Kurz, "The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the *Taiping yulan* and the *Cefu yuangui*," in *Qu'était-ce Qu'écrire une Encyclopedie en Chin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Vincennes, 2007), 39-76.

<sup>3</sup> Hilde De Weerd, "The Encyclopedia as Textbook: Selling Private Chinese Encyclopedias in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in *Qu'était-ce Qu'écrire une Encyclopedie en Chin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Vincennes, 2007), 77-102.

<sup>4</sup> 酒井忠夫，〈序言——日用類書と仁井田陞博士〉，收入酒井忠夫、坂出祥伸(編)，《中國日用類書集成》，1(東京：汲古書院，1999)，1-6。



政治的意圖之外，也是官方編纂者——皇帝及其欽定的學者們所知的自古到當代的知識的積累和編織方式；針對科舉考試而編輯的類書更是如此。其編者們將科舉考試所必需的知識分類編輯，一方面反映了編纂者們的知識體系之外，也把其知識體系傳播到每個讀書人；朱子的「格致論」是元、明知識分子探討知識和研究知識的主要方法。明末的文人應用「格致」的方法，研究古代的典籍和自然界的現象，而在類書方面，就是從對各種事物的文字表現方面，去分析、解讀而組織他們的知識。這種現象，在有關自然現象的描述可以看得清楚。<sup>5</sup>

綜合上述，我們可以知道類書充滿了編纂者的意志和對知識結構的想像，而且，在商業印刷的促成下，更有可能成爲一個普遍的知識現象。本文就是要在這樣的前提下，探討「類書」是如何記載有關自然界中的草木花果。經過仔細的分析，我們將可以發現宋代知識界變化的情形。

## 二、宋代的類書及其知識體系

如果單純地以爲「類書」僅僅只是抄錄文獻，並將之加以整理的資料集成，那真是大錯特錯。「類書」的發展，其實蘊含了古人對知識的態度和想法。以《四庫全書》的「子部·類書類」和《宋史·藝文志》的「類事」中所列諸多類書相比較，將會發現屬於《四庫全書》「政書」類的《通典》、《會要》等書，在《宋史·藝文志》中都收在「類事類」。這或許

---

<sup>5</sup> Benjamin Elman, "Collecting and Classifying: Ming Dynasty Compendia and Encyclopedias (Leishu)," in *Qu'était-ce Qu'écrire une Encyclopedie en Chin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Vincennes, 2007), 131-158.



已是意志著《宋史》的編纂者和清人對於何種書該屬於何種類別，已經有不同的認知。不過，於正史的子部中專列類書一項，其實是始自宋人。

《新唐書》的編纂者歐陽修(1007-1072)，為類書在其藝文志的子部中，單獨成類。這樣的結果，除了可能是歐陽修個人的獨特見解之外，也表示唐朝傳至宋朝的書中，已有許多的「類書」，不能再適用傳統的「九流十家」之分類，故需另成一類。但是，與《宋史》、《通志略》及其他宋代的書目相比，仍然是小巫見大巫。我們不得不承認，類書針對不同的用途而編輯，形成智識較高的和供日常用途的類書的分歧發展，是在宋代以後的事。<sup>6</sup>

宋代第一部編成的類書是《太平御覽》(以下簡稱為《御覽》，始修於太平興國二年(977)，成於太平興國八年(983))，乃為官方修纂。本類書內容，分門五十五部，總成一千卷，記載始自天文，次敘帝室王國，再敘文武百官之制、政治治民之術，再敘佛道、生活日用器物，最後以蟲魚鳥獸、草木果卉為終。再見其著明及不著明之書目，可謂是搜羅宋朝開國之時所能見到的各種古籍編纂而成的。<sup>7</sup>這樣的篇目編輯方式，或許我們可以將之視作代表

<sup>6</sup> 目前，關於「日用類書」的研究，從《事林廣記》到明清時代的各種日用類書，已有豐富的成果。較重要的，像是酒井忠夫的〈明代の日用類書と庶民教育〉、「Confucianism and Popular Educational Works」；仁井田陞的〈元明時代の村の規約と小作證書など—日用百科全書の類二十種の中から—〉；國內吳蕙芳的《萬寶全書：明清時期的民間生活實錄》、《明清以來民間生活知識的建構與傳遞》等。因此本文較無關係，故在此不再贅述。

<sup>7</sup> 《太平御覽》之編者自言：「……右計一千六百九十件外，有古律詩、賦、銘箴、雜書等類，不及具錄。」詳見(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覽》(臺北：



其編纂者們共有的知識體系，但是，這個體系並非《御覽》首創。按現行南宋慶元五年(1199)四川成都府路刊刻的《御覽》前所引的「國朝會要」可知，《修文御覽》(北齊)、《藝文類聚》(唐高祖)和《文思博要》(唐武后)等前代類書，是其參考的編輯範本。<sup>8</sup>茲以《藝文類聚》(以下簡稱《類聚》)為例。《類聚》乃是唐高祖於武德五年(622)下詔弘文館學士歐陽詢(557-641)等人編纂，於七年(624)完成。該書全部分成四十六門，共一百卷，規模較之《御覽》是小很多的。若從各門的編排次序來看，則彼此有極高的相似性。在各門裡，從天部、歲時部、地部等到果部、木部、鳥部、獸部、鱗介部、蟲豸部、災異部等，大致上亦是由天文地理、治道鑑戒到自然界的動植物，所引用的資料共有一千四百三十一種。<sup>9</sup>

《類聚》之成書，顯然亦有其本，卻也創了類書之新體系。<sup>10</sup>姑不論新體例如何，其編纂的秩序，應該為其他的唐代類書所模仿，如《初學記》(唐·徐堅(659729))、《白氏六帖》(唐·白居易(772-846))等。到了宋初，又為《御覽》所仿效。需要聲明的一點是，不論是《類聚》，或是《御覽》，

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冊1，4-21。

<sup>8</sup> (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覽》，冊1，3。

<sup>9</sup> 胡道靜，《中國古代的類書》，106。

<sup>10</sup> 歐陽詢在其所作的〈藝文類聚序〉中寫道：「以為前輩綴集，各杼其意，《流別》、《文選》專取其文，《皇覽》、《通略》直書其事。文義既殊，尋檢難一。爰詔撰其事且文，棄其浮雜，刪其冗長，金箱玉印，比類相從。……其有事出於文者，便不破之為事。故事居其前，文列於後。」其中的《流別》、《文選》、《皇覽》和《通略》應是歐陽詢等人所參考的範例，但是，他們也意識到其缺點，創造了「事文相從」的新體例。詳見(唐)歐陽詢，《藝文類聚》〔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藏嘉靖中(1522-1567)天水胡纘宗刊本〕，序，1a-b。





模仿的對象均是前代的官修類書。換言之，二者所反映出來的知識體系，是官方的知識體系；他們的編纂者利用皇家藏書的方便，搜覽了所能見到的書籍。再者，這樣的官修類書，其實也反映了政治大一統之下，統治者再進行文化一統的決心。<sup>11</sup>因此，在皇帝的支持下，他們必需編纂出一套能夠包容帝國所有知識的類書。尤其是《御覽》。例如，其所記載的四夷部，雖然看似傳統的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的分法，但其各部的分類之細，甚至包含了宋朝未曾接觸過的國家或民族；動植物和昆蟲的記載方面，《御覽》亦是分門別類，給予宋朝建國之時所知的大江南北各種物種細緻畫分，而且利用從地方志收集來的資料，將之形狀和地理位置予以定位。在這些項目中，《御覽》編輯群不只是從前代的經史文集中收取相關資料，以便於在政治的應對方面，能夠有所稽考而已。他們更是利用地方志資料，畫出了大一統帝國之下，各地風俗各異的地方性知識。

從《類聚》到《御覽》的發展，除了組織架構的一致性外，還能看到各種知識類別的更細緻化和廣範圍化。也許是宋初的皇家圖書館所能搜集

---

<sup>11</sup> 歐陽詢在〈藝文類聚序〉中云：「皇帝命代膺，期撫茲寶運，移澆風於季俗，反淳化於區中。戡亂靖人，無思不服。偃武修文，興開庠序，欲使家富隋珠，人懷荆玉。」反應出唐高祖於平定隋末的亂事後，重開文化教育的決心。詳見(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序，1a。而《御覽》背後的政治意義，前述Johannes L. Kurz的文章之結論中，已有相當清楚的闡述。他認為《御覽》修纂之時，宋朝甫成立，然其修纂乃意味著一個新的時代。所有的編纂者在一起工作，是宋朝首次將原分南、北的文官們集合在一起，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而工作。他們上溯的是唐朝的傳統，為的是恢復在五代十國時期混亂的文化。詳見Johannes L. Kurz, "The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the *Taiping yulan* and the *Cefu yuangui*," 66.



到的資料比唐初更多的緣故，因此宋初朝廷的學者們在編書的時候，必需將之更仔細的整理才行。這應該是《御覽》被大規模地分成了一千卷的原因之一。傅大為(Daiwei Fu)認為在宋代的中國，知識的分類上有《御覽》的系統和《太平廣記》的系統，影響了文人筆記、小說的編寫方式。而《御覽》系統的影響甚至大於《太平廣記》的系統。<sup>12</sup>但是，所謂《御覽》的體系只是一種表象而已。《御覽》的知識編排體系的確在以後的類書上留下了影子，但是，因應實際需要而出現的新型態類書，在宋代也開始發展起來。

宋代類書編排知識體系，從《御覽》分化出來，亦是始自官修類書，像是《文苑英華》和《冊府元龜》。前者之編纂始自太平興國七年(982)，是一在體例上模仿《文選》的類書作品，專收文學類的作品；後者始編於景德二年(1005)，專收正史和實錄等與治道有關的材料。自所收輯的材料上看，《文苑英華》和《冊府元龜》的取向，較之《御覽》是更為明顯的。但是，因這些類書是官修，故很難看出來在社會上的作用是什麼。但是，自此以後，各類書的編纂者呈現出來的知識編排傾向，越來越多元化，《御覽》的系統和其他因某種用途而編的類書之知識體系並存。從以下所舉的數例，我們大概能夠分辨出宋代以降，尤其是南宋以後，類書的編者因其功用之不同而顯現的知識體系。

在北宋期間，類書的編排，大體上還是遵從了《御覽》的體系。首先

---

<sup>12</sup> Daiwie Fu, "A Contextual and Taxonoimc Study of the "Divine Marvels" and "Strange Occurrences" in the *Mengxi bitan*," *Chinese Science* 11(1993-94): 3-35.



是《事類賦》。其編者吳淑(947-1002)曾參與《御覽》的編輯工作。而《御覽》成書之後，他作成了《事類賦》一書。全書的編排，亦是以天部為第一卷，以動植物的部門為最後。整體的編排雖然和《御覽》相似，然而，吳淑在此書不但創了以「駢四儷六」之文編排類書的先例，更有科舉考試上的實際用途。<sup>13</sup>其次是《事物紀原》(以下簡稱《紀原》)。此乃高承所撰，成於元豐年間(1078-1086)。該書原只有十卷，但經明代一再增補，竟擴張至二十卷，已難窺其宋代原貌。然據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所載，該書「自天地生植與夫禮樂、刑政、經籍、器用，下至博奕嬉戲之微，蟲魚飛走之類，無不考其所自來」。<sup>14</sup>明人雖增廣其內容，但似乎仍未更改其整體的編排體系。

南宋以後的類書，編排似乎已不再像《御覽》那樣，始編於開天闢地，終成於動植物，而有採取實用策略的傾向。最重要的一種類型是針對科舉考試設計的類書。科舉是宋朝擇取官員的主要管道，多數非官員家庭出身的人仰賴科舉加入官僚的行列。依南宋嘉定五年(1213)的一份政務人員進

---

<sup>13</sup> (宋)吳淑，《事類賦》〔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目錄，8b；該書於紹興十六年(1146)曾鏤版付印，據當中所附序云：「切觀四聲之作，起於齊梁，而盛於隋唐，今遂以為取士之階。其協辭比事，法度纖密，足以抑天下豪傑之氣。至於源流派別，凡有補於對偶聲韻者，豈可靳而不傳。」能看出《事類賦》在編成後，被視為對科舉考試有實際上的功用。但是，因駢體文在宋代的古文運動裡漸漸消沉，《事類賦》在場屋裡發生的作用為何？功用多大？在此已無法窺知。見(宋)吳淑，《事類賦》，(宋)邊惇德，「事類賦原序」，1b。

<sup>14</sup> (宋)晁公武撰，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下冊，1152。



途統計表中，經由科舉而為官的比例，占總官員人數的 54.1%，約有 10,483 人，而科舉考生和進士的比例，亦曾經超過 100:1。<sup>15</sup>

人員的競爭和宋神宗以來在科舉考試科目方面的改變，亦帶動了類書編纂的變化。事實上，早在慶曆(1041-1049)改革的時候，范仲淹(989-1052)等人就提出改革科舉考試的制度，尤其主張在進士考試方面，先行策論，再行詩賦，而且，策論考試不合格者，不得參加詩賦的考試。他們認為，經由這種方式選舉出來的官員，才有經世濟民的能力。這個建議，雖然隨著范仲淹等人的失勢而煙消雲散，後來王安石(1021-1086)主持的變法卻將之恢復了。他廢除了諸科學銜，將明經科提升到進士之列；取消詩賦的考試，而以精通五經(《詩》、《書》、《易》、《周禮》和《禮記》)和《論語》和《孟子》取代之。<sup>16</sup>他甚至還控制了科舉考試的用書，作《三經新義》以為科舉考試必讀。因「論」和「策」講求經義之闡釋和時政之發揮，伴隨著官學之推廣和書肆出版業的發達，與解經和時事相關的冊子，一時充斥市面。

競爭激烈的事實和考試走向實用化的結果，終致弊端叢生。從北宋末年開始，朝臣即不斷發出聲音，認為當時的考生，只知利用、模仿市面所出的參考用書，不再親自讀經，甚至買些版型小，「可置掌握」的小冊子，帶進考場，以行舞弊。<sup>17</sup>到了南宋，更有人抱怨士子考試答題之差。乾道

---

<sup>15</sup> 賈志揚(John Chaffee)，《宋代科舉》(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29-67。

<sup>16</sup> 賈志揚(John Chaffee)，《宋代科舉》，101-142。

<sup>17</sup> 《宋會要輯稿》中，收錄了不少類似的批評，如崇寧二年(1103)九月十日臣寮言：「竊謂使士知經，咸欲如元豐之盛，莫若取諸經時文印板，一切



七年(1171)三月二日，時任試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的留正便認為，朝廷應該將考試合格者的優秀答案，整理出版，使之「庶幾傳布四方，士子知所適從，於時政亦有所補」，以改士人「議論膚淺，而以怪語相高，對策全無記問，而以浮辭求勝。大抵策尤卑弱，不足傳示四方」的缺憾。<sup>18</sup>

考試競爭激烈、考題以「論」和「策」為尚，加以答題方式越來越定制化的結果，為科舉考試而設計的類書盡出，書肆商賈亦爭相刻印販售。<sup>19</sup>其中一種類型，可視如科舉的模擬考題範本。《八面鋒》，大概成

---

焚毀。今後除府覽發解省試并太學補試、公私試第一名經義方許印行，其餘悉不得賈售雜亂。仍行下國子監嚴立科條，開封府常切檢察。從之。」見(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57)，冊5，選舉四，3b。又如政和二年(1112)正月二十四日臣言：「輿論以謂士人溺於元祐挾書之習者尚多有之，蠅頭細字，綴成小冊。引試既畢，遺編蠹簡，幾至堆積。兼鬻書者以《三經新義》并莊、老子說等作小冊刊印，可置掌握，人競求買，以備場屋檢閱之用。雖其法甚嚴，而前此有司往往愛惜士風，未之舉行，遂致荒唐繆悠之人，公然抵冒，無復忌憚。竊謂義理本以待士，彼或冒法，則非士也，尚何恤乎？伏望聖慈申嚴懷挾之禁，增重巡鋪縱容之責。印行小字《三經新義》，亦乞嚴降睿旨，禁止施行。」從之。見(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選舉四，7b-8a。

<sup>18</sup> (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選舉四，40b-41a。

<sup>19</sup> 關於科舉考試的解題方式日益標準化的問題，《四庫全書》所收南宋時期答題技巧書籍《論學繩尺》前的「提要」，有一段切中要旨的敘述：「南渡以後，講求漸密，程式漸嚴。試官執定格以待人，人亦循其定格以求合。於是雙關三扇之說興，而場屋之作遂別有軌度。雖有縱橫奇緯之才，亦不得而越此編。……紹興重修貢舉條式中，試卷犯點抹條下有論策經義連用本朝人文集十句之禁，知拘守之餘，變為剽竊，故以是防其弊矣。」見(宋)魏天應編，《論學繩尺》〔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提要，2b。而關於南宋策論考試逐漸標準化的發展過程和答題技巧，可看Hilde De Weerdt的討論，在此不再贅述。見Hilde De Weerdt, *Competition over Content*:



於紹興至嘉泰年間(1131-1205)，乃是以「策」的答題技巧為訴求。是書分成十三卷，九十三條主題，每條主題旁皆有提示可以發揮的關鍵小字，例如主題是「示人以法不若以意」，而其可引發聯想的關鍵字則有「勸農、任官、懲貪、聚斂」；主題是「人主好要則百事詳」，其可發揮的綱要是「治兵、理財、治獄、擇吏」。<sup>20</sup>大體上，全書以執政所需之意見為主，通篇引經據典，並結合時務。《群書會元截江網》亦大體如此。本書不著撰人，而《四庫全書》在編寫時，認為當中因有「太學增修」的字樣，推測應該是太學中當作課本的教科書。由於在南宋，太學裡所作的「時文」為「四方視以為法」，該書若是收集有名的「論」和「策」，編成教科書後在太學裡使用，是可能的。<sup>21</sup>該書分成三十五卷六十五門，每門下附有子目。例如在第一卷的「聖制」目裡，先鋪陳歷代事實，次敘宋朝的事實、經傳格言、名臣奏議、諸儒至論。這些小項目所載應該是寫作策論時所需參考的資料，並且，諸項之後附有所謂「對偶」一項，所述皆是與前項內容有關之韻文，大概是為了方便記憶所作的。在這些小項目之後，應該是據前面的資料發揮所作的「論」或「策」，成分成了主意、事證、時政、警段和結尾諸段，各段亦附有「對偶」，傳授了寫作的祕訣。另一種類型

---

*Negotiating Standards for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Imperial China(1127-1279)*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55-85. 而將類書應用於考試，以及印刷商設計販賣的情形，亦可見Hilde De Weerdt, "The Encyclopedia as Textbook: Selling Private Chinese Encyclopedias in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77-102.

<sup>20</sup> (宋)陳傅良等，《八面鋒》〔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1，7a-8b；卷4，8a-10b。

<sup>21</sup> (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選舉四，40b-41a。



是以記述在宋朝的諸種學說、諸史、諸制度等的源流為主的類書。林駟和黃履翁所作的《古今源流至論》和呂祖謙(1137-1181)所編的《歷代制度詳說》就是這種類型。

從《八面鋒》和《群書會元截江網》之類，模擬策論題型的類書可以知道，僅僅只知道一些答題的技巧，只知道一些制度的歷史是不夠的。試子們要精通經、史、子、集各部門的知識才足以應付。很顯然，這樣的要求會讓這些兢兢業業於舉業的讀書人們感受到知識爆炸的危機。為了滿足士子們迅速取得考試所需具備之知識的需求，甚至是在為官時，可以作為與人辯論政策之資，一些大型的類書應運而生，例如《錦繡萬花谷》(淳熙十五年(1188))、《群書考索》(慶元年間(1195-1201))、《記纂淵海》(嘉定二年(1209))、《玉海》(淳祐元年(1241))、《古今事文類聚》(淳祐六年(1246))和《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寶祐五年(1257))。這種類型的類書，所編通常不只僅有一集，而是前集、後集、續集、別集等的陸續編成。前所列舉的這些類書中，除了《錦繡萬花谷》的編者曾經說明自己的分集原則外，因為大多數的類書並沒有留下編者的序言，我們已經難以猜測分集出版是出於己意，或是書肆所為。但是，能夠以分集的方式陸續出版，暗示我們，這些書的需求量其實不少。若從其編排和所收的內容來討論的話，或許就能夠知道他們為什麼受歡迎的原因了。茲以目錄編排較為仔細的《群書考索》來看。

《群書考索》又名《山堂考索》(以下簡稱《考索》)，是章如愚所作(慶元中進士(1195-1201))，成書於南宋寧宗年間(1195-1224)。全書分四集，前集有六十六卷，依序分成六經、諸子、百家、諸經、諸史、聖翰、書目、文章、禮、禮器、樂、律呂、曆數、天文和地理等十三門；後集有六十五卷，



依序畫爲官制、學制、貢舉、兵制、食貨、財用、刑法等七門；續集有五十六卷，前後分成經籍、諸史、文章、翰墨、律歷、律、曆、五行、禮樂、封建、官制、兵制、財用、輿地、君道、臣道和聖賢等十五門；別集有二十五卷，按圖書、經籍、諸史、禮樂、曆、人臣、士、財用、兵、夷狄和邊防等順序分成十一門。各集的內容間或有所重覆或矛盾之處，大體上，也都兼容了「論」和「策」所會出題的內容。《四庫全書》的編者在《考索》的提要裡提到章如愚的文集作品均以散佚，唯此書尚存，想必和其在業舉者間受歡迎的程度不無關係。

姑不論其市場的受歡迎程度如何，光從《考索》諸門類的編排，也足以顯示其與科舉考試之間的關係；《考索》也不再只是單純的抄錄集成。某些在宋朝成爲重要議題的項目，章如愚先列舉了其發展來歷，最後再加上自己的評論。就拿後集「士門」裡的「儒學」一項來看。他先列舉了宋朝設置學校的制度、著名的學者、科舉制度之發展，最後以「總論」來提出他對到宋朝爲止的儒學的發展的看法：儒學在宋朝的發展，以「有用」而稱，因此有人講究邊防，有人講究水利，有人講究政事，有人講究文學。除了科舉之學外，當有義理之學、物理之學、性命之學等。儒學的衍化發展，和當代儒學講明「體用」不無關係。<sup>22</sup>而在一項題爲「唐賦稅鹽茶酒錢楮坑冶銅禁」的論述中，章如愚則討論了宋朝的稅賦制度多因襲唐朝，爲何宋朝的財用明顯不如唐朝的原因。他認爲，宋朝比之於唐朝，最壞之

---

<sup>22</sup> 章如愚自言：「有所學必有所用。學而無用，與不學等耳。使人人盡棄科舉而談虛空，則國誰與理，民誰與治耶？」見(宋)章如愚，《群書考索》(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2)，冊1，後集，卷30，642。





處在於處理財政的官員專業程度不足，「以財賦之職為假途」。因「天下之事皆易知，惟財計之弊非深明其利害，則未易論也」，不敬業的財政官員，自然無法滿足財政問題的需要。<sup>23</sup>

直如上述，《考索》不但只有羅列經史而已，更加上評論，對於準備科舉考試的試子們而言，當然是一套相當有價值的參考書。如果考慮到章如愚是慶元年間的合格進士，初任國子博士，又掌詔誥制敕的擬定，又因上疏陳時政遭韓侂胄之忌而罷官，那麼，我認為這套書在科舉考試方面，更具權威。<sup>24</sup>與《考索》編排方式類似的類書，尚有《記纂淵海》、《玉海》等。

這些類書的編排方式，乍看之下，與《御覽》的呈現方式無多大不同。然而仔細比較的話，這些類書的編纂者們所想要呈現的知識體系，和從帝國或皇帝的立場出發，展現出來的知識體系全然不同。最明顯的分別是，這些編纂者們已不再編入歷代帝王和王國，亦即是《類聚》或《御覽》中的「帝王部」和「偏霸部」。其次則是收錄日用器物、藥物、草木花果、蟲鳥魚獸的部分，鮮少見在其列。關於前者，或許可以用余英時先生提出的「(君臣)同治天下」之概念來解釋。他認為宋代的士大夫在世家大族的瓦解和儒家理想的復興之下，產生了極強的「以天下為己任」的態度，而且，因為持著「道」或「義」的最高原則，強調士大夫在統治社會方面，和皇帝一樣具有正當性，故而形成了同治天下的概念。<sup>25</sup>或許就是在晚唐

<sup>23</sup> (宋)章如愚，《群書考索》，冊2，後集，卷52，

<sup>24</sup> (宋)章如愚，《群書考索》，冊1，前集，卷首，3。

<sup>25</sup>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臺北：允晨文化，2003)，冊1，287-312。



到宋代的發展過程中，現實的環境導致中古時代貴族社會的消滅，而且科舉考試大行的結果，讓宋代的士大夫有機會填補貴族社會遺留下來的空白。士大夫的地位因此提高了。在這樣的情況下，屬於士大夫階層的共同知識，想當然地超過了代表皇帝的知識體系。故而從北宋的《事類賦》、《事物紀原》到南宋的《考索》等科舉型類書的發展，越來越傾向具實用性，與治道有關的內容。也因為如此，知識的追求，就有了輕重緩急、實用與娛樂的分別了。

如何說明知識有了輕重緩急、實用和娛樂的分別？以下將試從《錦繡萬花谷》和《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的序言來分析。

《錦繡萬花谷》，共有前集、後集、續集和別集等四集，不知編纂者為誰，但因存有一篇淳熙十五年(1118)所作的序，推測該書的出版應該是在當時。根據序中所言，出版該書是無心插柳。作者的幼年正當北宋南宋之交，兵馬空虛之際，又因所居無業儒者，所以在書籍的取得方面頗為困難。及長又為生計奔走，讀書的過程不勝辛苦。因此，在讀書的過程中，往往勤作筆記，抄錄書摘。如此作的原因無他，科舉是最重要的考量。但是，一如作者自言，他抄書的結果是「鎖碎而無統」，又往往據自己的好惡取舍；儘管旁徵博引，卻是體系複雜。<sup>26</sup>到了晚年，作者的讀書興趣有了轉變：

晚益因無以自娛，復留意於科舉之外，凡古人文集、佛老異書，  
至于百家傳記、醫技稗官、齊諧小說、錄錄恠志，聞必求，求必

---

<sup>26</sup> (宋)不著撰人，《錦繡萬花谷》〔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嘉靖十五年(1536)序錫山秦汴鑄石書堂刊本〕，序，1a-2a。



覽焉。久之，浩浩如也，乃略有敘。……國家規恢乎功名，雕繪萬物，而吟詠性情，若取懷袖中，彼得焉失焉有命，此則不可一日缺也。<sup>27</sup>

在他的心目中，知識是有高下之別，實用與賞玩之趣的。多方搜集、記錄與科舉考試、擔任官職有關的知識，是年輕時讀書的重點，也是國家創設科舉考試制度所不得不注意者。作為日常生活所需的醫學、傳聞、小說、宗教等的知識，因其中並不如經學和制度等含有治理國家大政所必需的知識，雖不能少，但也僅是供娛樂而已。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是出於南宋末年的一套類書，分成前集、後集、續集、別集和外集，作者為謝維新，完成於寶祐五年(1257)。在序言中，作者對於當時市面上充斥的類書編排頗有不滿之處。他認為，類書的發展，在他那個時代已經相當充分了，而由於「其視夫徒載首尾而不得其要，分門目而備失其倫者，萬萬不侔」，故有不少缺點。<sup>28</sup>細細咀嚼此言，謝維新所不滿的，是在於當時充斥於「兩坊書市」，以「類書」為名的書籍太過於科舉傾向，所編所記，甚至所論者皆以科舉為第一優先，才會發出此言。或許就是其弊如此<sup>29</sup>，謝維新提出了他的編書原則：

<sup>27</sup> (宋)不著撰人，《錦繡萬花谷》，序，2a。

<sup>28</sup> (宋)謝維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原序」，1a-b。

<sup>29</sup> 《四庫全書》的編者對於宋代類書的缺點，曾經提出如下的觀察結果：「宋自神宗罷詩賦，用策論取士，學者咸思以博綜古今，參攷典制為務。而又古其浩瀚不可猝窮，於是類事之家往往排比聯貫，蒼粹成書，以供場屋採掇之用。其時麻沙書坊刊本最多，大抵出自鄉塾陋儒，勦襲陳言，概無足取。」儘管批評負面，但是市場的需求量大，倉促成書者可能真的不少，



今而是編，始而天文地理，次而節序人物，以至族屬官職姓氏之分，儒學仕進、道釋技藝之等，與夫吉凶慶弔、冠婚喪祭之儀，草木蟲魚、器用動什之末，莫不類而得其備，備而得其要。其間別以標題，配以合璧，俾閱是編者，求其一則知其二，觀於此則得於彼。<sup>30</sup>

僅就這個原則而言，謝維新的知識體系和《御覽》的傳統不謀而合，頗有回歸《御覽》傳統的意味。最值得注意的是他視日用草木蟲魚、器用動什之學是學問之末流。此仍意味著，科學、為官所必需的知識，是追求學問者所必需先明白、了解的，而其他的學問並沒有如此的迫切性。

類書在整個宋代的發展過程中，不但是私修的類書取代了官修類書，由《類聚》到《御覽》所代表的知識體系，也因科舉考試的實用性考量而發生變化。我們或許可以說，因應科舉而生的類書編纂，是宋代士人文化發達的一種代表。不過，類書的大量出現，其實也呈現了宋代讀書人所面臨的知識危機。如果仔細比對眾多類書之中為數不多的序文，將會發現像這樣的言論：

昔人嘗曰文以載道，書以紀文。夫道之廣大，非文無以載，文之浩瀚，非書無以紀。故必載之文，則廣大者有所寓紀之書，則浩瀚者有所歸矣。於戲！自羲皇迄於有宋，歷數千百世，紀事之書汗牛充棟，欲遍觀歷覽，將不勝檢閱之勞，況窮陬僻壤，求之不

---

因此品質也難以兼固了。詳見(宋)林駟、黃履翁撰，《古今源流至論》〔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提要，1b。

<sup>30</sup> (宋)謝維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原序，1b。



得，見之不廣者乎？<sup>31</sup>

當時的讀書人因處在科舉和印刷發達的環境裡，自然汲汲營營於科舉知識的渴求和相關書物的取得。一本一本地檢閱書籍，顯然是緩不濟急了。他們需要明確的指引，類書的編排方式，正好符合需要。而也由於類書是分類整理的性質，不論是原始的材料出處，甚或編纂者自己的言論、看法，均分別子目，一一歸納，能提供最迅速和被認為是正確的指引。在希望搜羅的知識是貫通古今、鉅細靡遺的理想下，編纂者們提供的是一種能夠有效使用的知識，而讀者們自然也相信經過分類和輯纂的知識是有意義的，能夠讓他們在科舉考試的準備上快速上手。

這樣的知識危機既然是來自於自古代以來的典籍的累積，類書的編纂者們用一套沿習以已久的知識體系來處理危機應該是可以理解的，至少，他們能為各式各樣不同的知識找到一個合適的位置。但是，為求效用，在知識的類門方面，自然也要有所減裁，以達到危機處理的效果。由於科舉考試講究的是試子們對時政的批評或意見，日用什物、花草蟲獸等與時政

---

<sup>31</sup> 此語出《群書會元截江網》之序言。相似的論述還有很多，像《古今事文類聚》的序文裡提到：「使有一書之未讀，一物之不知，則將見群疑塞胸，無說可祛，萬事博手，無術可應。」《錦繡萬花谷》的序言中，作者也自言其「所患性魯，無彊記之敏，誦久亦漫漶而不牢。」潘自牧在《記纂淵海》的自序中也提到：「世無類書，博聞強記者不能無遺，世有類書，因陋就簡者恃以為足。凡類書之作，前輩本以備遺忘，便採擇，亦非以為後學苟且之資也。」詳見(宋)不著撰人，《群書會元截江網》〔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群書會元截江網原序，1a-b；(宋)祝穆，《古今事文類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古今事文類聚原序，1a；(宋)不著撰人，《錦繡萬花谷》，序，1a；(宋)潘自牧，《記纂淵海》(北京：中華書局，1988)，冊1，1。



無大干係的知識，雖有娛樂之效，卻不過是末流，可採列，也可不採列。《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的作者謝維新有雄心壯志，希望編纂出和《御覽》的知識體系相合的類書，以讓所搜索的每件事都能窮其源，最後也不得不向現實的市場需求低頭。五集之中的外集是在前四集市場熱銷的情況下再刊行的，分成禮樂、刑法、獄訟、賦稅、征役、平糶、服飾、璽印、香茶、餽遺、飲膳、器用、珍寶、錦綺、布帛、錢楮諸門，共六十六卷。<sup>32</sup>諸門類中，他不得不將與治道有關的門類分得比服飾、香茶等更為仔細，因為市場上對治道門類有關的需求，一定比服飾、香茶等的要得更多。

然而，我們不能否認，以治道內容為主流的類書中，亦有談論動植物內容者。那些類書的編者們是如何來記載這些自娛之作、草木蟲魚之類的未流知識的呢？下文繼續討論。

### 三、宋代類書中的草木花果

宋代的類書，一直發展到南宋，以科舉取向為優先的內容，成為類書編纂的主流。但是，出於嗜好，或是為了知識體系的完整，也有少數的類書收集和動植物有關的知識。隨著類書在宋代的蓬勃發展，編纂者所顯現出來的動植物知識是否也有改變？以下將從《御覽》、《事物紀原》、《錦繡萬花谷》、《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和《全芳備祖》等五本類書中所收的動植物內容來討論。這五本類書和有《群書考索》、《玉海》、《歷代制度詳說》等類書中所沒有的自然界動植物之部門，故選擇之以有別於其他

---

<sup>32</sup> (宋)謝維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總目，7b-8b。



類型的類書。

前面已經提及，《御覽》所代表的是整個大一統帝國的全部知識，因此，不論是搜羅的資料或記錄的項目，範圍均相當廣泛。但是因為動植物的知識在以《御覽》為範本的知識體系中屬於末流，因此，被編排在最後的幾卷中。《御覽》總成的一千卷裡，自第八百八十九卷開始，記載的均是關於動植物的知識。其記載的方式，以「羽族部一·鳥」而言，大致上是以《爾雅》、各經、各史和諸子的內容，依序排列來記。在古代，《爾雅》因被認為是教導學生字的讀音和事物意義的入門書籍，故放在所列知識的前面，宛如給這些知識一個確切的名稱，並且將之在整個知識網絡上的位置定了下來。在「鳥」裡，《爾雅》就告訴讀者如何分辨雄鳥和雌鳥：「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sup>33</sup>以後各經、各史和各子的內容，所記的只是在說明曾有何事提到「鳥」，甚至和鳥有關的異事內容，也被收錄其中。說完「鳥」的這個族類之後，以下的各卷即開始分述各種鳥族。若以各種資料的來源作比例分析的話，離傳統文明重心的華北越遠，所收的資料越少，僅以少數的地方志書補足這樣的缺陋。尤其是屬於南方風土的動植物，更是如此。例如「檳榔」，《御覽》的編輯者們無法用《爾雅》的傳統為其在以中原為主的知識圈中找到位置，只好在地方志中尋找。我們可以看到在「檳榔」這個項目裡，編者大量引用了《吳錄地理志》、《南中八郡志》、《廣州記》、《雲南記》等地方志，以及專記南方事物的《南方草物狀》和《嶺表錄異》等的資料。運用這些資料的結果，無異就是編

<sup>33</sup> (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覽》，冊5，卷914，4181。



者們承認了「檳榔」這種植物的異域性質，是一種不同於中原傳統的新植物。認識這種新的植物，必須從對其最基本的觀察開始，因此，讀者能看到的是編者們所摘錄的材料，均與「檳榔」的外表現狀、果實的味道以及其與當地土人之間風俗結合的關係，很少有像記載北方植物那樣給予多餘的附會。<sup>34</sup>透過這樣的處理程序，「檳榔」將會像《爾雅》裡面所記載的植物那樣，有讀音和意義。總之，編者們將會成功地將之納入中原傳統的知識網絡之內。

後來的類書，像《御覽》這樣先給予所記載事物一個明確的定義之後，再敘事和敘文的編排法已經不多見，採錄的項目也少很多，只占整部類書的一小部分而已。以《事物紀原》為例，總收草木花果類共二十九項，每項的敘述不過數句。<sup>35</sup>當中的記載，以在唐朝的現象最為詳細，唐代以前和宋朝當時的狀況如何，已不見記載。當然，這樣的呈現方式，也許和編者採用的資料有關。在《事物紀原》裡，編者採用的，大多是唐朝的文本，像是劉餗的《隋唐嘉話》、段成式的《酉陽雜俎》，當中也穿插一些《唐會要》和《本草經》的材料。相較於《事物紀原》中的其他項目，尤其是與職官制度有關的項目經常唐宋兼提，甚至針對宋代的記載甚詳的情況來看，草木花果類的記載就顯得疏略許多了。如果再考慮到明朝重刊的《事物紀原》狀況，當時既不知其編者為誰、宋朝刊本亡佚，僅存抄本、總體編幅較宋朝的原十卷本多出一倍等因素，草木花果一門是否是宋朝原刊本

<sup>34</sup> (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覽》，冊5，卷971，4436-4437。

<sup>35</sup> (宋)高承(明正統十二年(1447)刊本不著撰人)，《事物紀原集類》(臺北：新興書局，1976)，727-738。





所有，是相當可疑的。<sup>36</sup>

《錦繡萬花谷》的後集，自卷三十七至三十八，所收亦是草木花果諸類，但總共只有十八項。就共出了四集、規模可謂龐大的《錦繡萬花谷》而言，所占不過鳳毛麟角。所載的內容亦不可謂有創新。綜觀其所收錄的資料，記事的筆記、史傳，文學類的文集、詩詞均有，但在賦予各項目一明確的定義方面從缺，與《御覽》的記法大有不同。<sup>37</sup>

《御覽》在編成後，不論是刊刻的年代，或是流通的情形，我們均不甚了解。現在唯可知者，是《御覽》在南宋時已經刊刻，且有品質較差的建本和品質較好的蜀本二種。當《錦繡萬花谷》刊刻之時，《御覽》已經在市面上流通也不一定。但是不論是可能上溯《類聚》和《御覽》傳統的《事物紀原》，或是《錦繡萬花谷》，都不再像《御覽》那樣詳細地記載每一項草木花果。雖然偶爾也會引用藥草學的《本草經》當中的記述，然而，他們在對曾經提到某項草木花果的事或文的收搜集、排列，遠遠超過對於其品名的定義和形狀、性質的描述。這樣的做法，可能在作文、作詩

---

<sup>36</sup> 經明朝重輯、刊刻的宋代類書，其編目與宋代原本相異的例子，並非只有《事物紀原》一例，《記纂淵海》更是明顯可見。《記纂淵海》刊於嘉定二年(1209)。據編者潘自牧自為的序中，可知原書總有236卷，而明刊本僅只有100卷。比較北京中華書局於1988年收集的北京圖書館、遼寧圖書館所藏的三個宋本，考訂出版的195卷《記纂淵海》和臺北新興書局於1972年據萬曆七年(1579)刻本影印出版的《記纂淵海》，不僅卷次的編目極為不同外，還多了宋刻本所沒有動植物類門。詳見(宋)潘自牧，《記纂淵海》(北京：中華書局，1988)，全四冊；(宋)潘自牧撰，(明)王嘉賓補遺，《記纂淵海》(臺北：新興書局，1972)，全四冊。

<sup>37</sup> (宋)不著撰人，《錦繡萬花谷》，後集，卷37，1a-11b；後集，卷37，1a-9b。



方面，當要運用某種植物入題時，或許會有不小的幫助，但是，對於各種草木的自然學認識，想必未能發生太大的作用。科舉環境，重視人事甚於自然，視自然之學為學問之末流，甚至是娛樂之作應該是相當重要的因素。

不過，像這種從大量從文學和記事入手，不參考大量的草本、地方志記載的研究草木花果的方法，在南宋末年有了改變。重要的代表有《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和《全芳備祖》。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成書於寶祐五年(1256)是建安太學生謝維新所編。是書收錄的每個項目，在最首處均有總論，敘述各物的源流和現況；記敘動植物的部分名之為「格物總論」。茲以「花門·牡丹花」觀之：

格物叢話：牡丹，花之富貴者也。按本草，一名鹿韭，一名鼠姑，論者以為花王。攷之前史無說，自謝康樂集中始言水間竹際多有之，而北齊楊子華有牡丹畫極佳，則知此花之來久矣，但隋文士集中無詩歌，是隋朝花藥中所無者。隋《種法》七十卷亦無其名。開元宋裴士淹得之汾州，天寶中又為都城奇賞。元和物猶少，至正元中已多，漸與戎葵同矣。然其土產又有可言者，或出於丹州，或出於延州，東則出青州，南亦出越州，惟出於洛陽者為天下第一。是何造化之巧，獨私於洛陽，而它方則不然也。然其品類尤為不一。不紅則孫，不黃則白，如此之色，或深而或淺。其名稱亦各不同，如姚黃，如魏泰，如朱砂紅、玉版白。如此之名字，有高而有下。前賢雖有普之者，恐此花之變態不常，有非耳目之所能遍，亦姑言大略爾。惟夫出於洛陽者，樹大而花亦大；出於江南者，樹小而花亦小。花之小者，姑置勿論，花之大者，盈尺



許面也，亦不可以一槩觀焉。<sup>38</sup>

謝維新的作法，不但詳論了牡丹花的各種別名，發展的時間，就連產地、生長環境之不同，花的顏色和大小亦有異的性質也一概點出。而且，他也承認當代對牡丹花的認識尚有不足之處，所說只能涵蓋大概。和《事物紀原》、《錦繡萬花谷》，從記事、文學等的材料去摘錄文獻上事蹟不同，謝維新在此用的是一個新的觀念——「格物」來處理這些實際存在的自然事物。

無獨有偶，大約在同一個時期編成的《全芳備祖》，也是用「格物」的概念來分析自然界動植物的知識。《全芳備祖》大概成於寶祐元年(1253)，是一部專門記載草木花果的類書。為何會出現這樣的一部類書、編者如何將「格物」的概念運用在編寫類書上，在其序言中有明確的表達。據序的作者韓境所說，陳景沂對於當世流行的類書頗為不滿。他承認宋朝的類書是很發達，但是，流於搜集記載事項的品種類別，或是在編輯方法上相互競爭，關於草木花果的記載則付之闕如。為承繼前人的足跡，彌補宋代類書的不足，他特別將他遊覽江淮、觀山川之勝景的所見所聞編輯成書，在每件事物方面窮其源頭，相關的文學作品則付於後。<sup>39</sup>

按韓境在序裡所說，陳景沂晚年之時，對於年少所編的是書甚為懊悔，慶興自己能在晚年之時心歸樸素，專注於格物窮理之學。然而，韓境勸他說，是書所舉，就是格物窮理之學：

盈天壤間皆物也。物具一性，性得則理存焉。《大學》所謂格物

<sup>38</sup> (宋)謝維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24，1a-b。

<sup>39</sup> (宋)陳景沂，《全芳備祖》〔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序，1a-b。



者，格此物也。今君晚而窮理，其昭明貫通，倏然是非，得喪之表，毋亦自其少時區別草木有得於格物之功歟？<sup>40</sup>

用《大學》中「格物」的概念來研究學問，是宋代程朱一派理學的特色。在朱熹的概念中，目光所及的事事物物皆有其理，甚至動物、植物、微小的昆蟲都有其理。但是，「理」是無法捉摸的，唯有從格物入手，格到了極致，才能得到「理」。<sup>41</sup>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朱熹所著重的不是在自然界的動植物方面花了多了工夫，得到多少成就，他所肯定的，是從萬物之中得到理，並以之提升道德的修養，進而達到經世濟民的目的。

有多少人能夠從「格物」中得到，甚或頓悟其所欲得知，能夠提升道德修養、經世濟民的「理」，我們無從得知。而若從理學發展的脈絡來看，經過了偽學之禁(1195-1202)，至理宗寶祐年間，理學的優勢地位已經確定。理學，或稱道學的思想已經根植於當時的類書編纂中<sup>42</sup>，理學的理念也早就成為科舉考試的必考題。風氣所及，「格物」已不能再只從書本上去求知其「理」而已了，對於萬物的總總變化和其根本，非得窮究至極，否則無以得知。套用「格物」的理論和方法，《御覽》、《事物紀原》和《錦

<sup>40</sup> (宋)陳景沂，《全芳備祖》，序，2a。

<sup>41</sup> (宋)黎靖得 編，王星賢 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冊1，卷15，289：格物，不說窮理，卻言格物。蓋言理，則無可捉摸，物有時而離；言物，則理自在，自是離不得。」；「窮理」二字不若格物之為切，便就事物上窮格。如漢人多推秦之所以失，漢之所以得，故得失易見。然彼亦無那格底意思。若格之而極其至，則秦猶有餘失，漢亦當有餘得也。」又云：「格，謂至也，所謂實行到那地頭。如南劍人往建寧，須到得郡廳上，方是至，若只到建陽境上，即不謂之至也。」

<sup>42</sup> Hilde De Weerd, *Competition over Content*, 273-276.



繡萬花谷》對草木花果的談法變顯得混亂、單薄。尤其是《事物紀原》和《錦繡萬花谷》的談法，既無法顯示其名稱來由，其間的相關變化也只是支字片語，無法得其大觀。相反地，用「格物」的方法來看自然界的草木花果，不只能夠把源流和諸種說法弄得清楚，也能夠把其他人對於某些草木花果的感情弄得更清楚、明白。陳景沂編纂《全芳備祖》時，先詳述某種植物的名稱、產地、性質等，再述歷代以來的變化，最後附上文人對某種植物的詩賦吟詠，在韓境的眼中，就是「格物窮理」之法了。

綜合以上的分析，南宋晚期的類書，在對草木花果的記載和分析方面，似乎有拋棄因應科舉而將之視為末流、娛樂之作而回歸《御覽》傳統的味道。但是，《御覽》的方法已經不可行，新的方法，一種完全屬於宋代士大夫文化發展下的方法，而非中古時代貴族氣味濃厚或官方味道深厚的方法——「格物」來重新組織這些原來已經被科舉所遺棄的知識。雖然不像明朝的李時珍著作《本草綱目》時那樣，非得上山下海，搜集新的資訊來改正舊本草學的謬誤不可，南宋晚期的類書，用「格物」的方法，已經開始要求對所見所記的草木花果的真實面貌有所描述。朱熹講究「格物」的本意是在提升道德的形而上學上下功夫，卻因為強調「理」就存在萬事萬物之中，而造成了講求理學的人面對自然事物時非得有一個求近於事實的基本功夫不可。

因為「格物」而講求實事求是，記載自然萬物的風氣，無異為當時因科舉考試競爭激烈而無緣中舉、必須轉作他途的人開了另一扇門。南宋時人袁采(隆興元年(1163)進士)就認為士大夫之家的子弟，若無法考中科舉，則



「巫醫僧道農圃商賈伎術，凡可以養生而不至於辱先者皆可爲也。」<sup>43</sup>儒醫是宋代醫療文化中的一項特色，從醫想必是無法從事舉業者的另一出路。「格物」的理念，儘管無法助其考上科舉，也能在醫學臨床上有所助益。南宋以來藥物學的革新，不能說完全不受「格物」的影響。<sup>44</sup>

#### 四、 結論

「類書」作為中國古代知識體系的代表，應是當之無愧的。儘管類書編纂的起源眾說紛紜，然而直到唐代，不論是編纂的方法、編纂的體例，或是類書的使用，均已有一定的模式。宋代類書的編纂，始自《太平御覽》，其編纂方法和體例大體上承續唐朝，且有天下再度大一統之後，總合當今可得所有知識的用意。從其搜集文獻之多、卷數之繁和分門之細，以及儘量擴及大江南北所有事物的作法可以窺見一斑。《太平御覽》、《太平廣記》、《冊府元龜》、《文苑英華》等四大官修類書之後，宋代類書的編纂權便落到士大夫的手中。

宋代的私修類書是有為科舉考試之用的實際考量的。由於宋代官僚的

---

<sup>43</sup> (宋)袁采，《袁氏世範》[叢書集成新編本](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冊33，卷5，154，「子弟當習儒業」條。

<sup>44</sup> Frédéric Obringer在“A Song Innovation in Pharmacotherapy”一文中提到從宋到金，醫生從理論、製藥技術、藥劑知識和臨床經驗方面了解砒霜的作用和毒害，並漸次以其他藥物取代之的革新。詳見Frédéric Obringer, trans. by Janet Lloyd, “A Song Innovation in Pharmacotherapy: Some Remarks on the Use of White Arsenic and flowers of Arsenic,” in Elisabeth Hsu, ed., *Innovation in Chinese Medicin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92-213.



主要來源是中舉的士大夫，而且科舉考試的考試方法和考試科目在宋代也有大變革，造成考生激烈地競爭和迅速熟悉考試科目的需求。「論」和「策」是王安石變法後，科舉考試所需注意的主題，而題庫就在經書、史書、政府制度和時政中。考生要從數量龐大的書籍中入手，分類歸納而記著考試所必要的知識幾乎是不可能的。他們在面對這麼多的資料不由得產生「知識的危機感」。區分主題、分類和整理過後的類書，不但能夠給予考生迅速入手的指引，也能使知識的運用更有效益。專門教導如何答題的類書、分類整理經典、歷史和制度的類書就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了。以科舉所需為尚，和自然界知識有關的記載自然處於附庸的地位，甚至被忽略不談。

自然界動植物的記載在《太平御覽》中，占有比其他宋代類書更大的篇幅。其記載方式，大體上以《爾雅》為首，先給所記的項目一個明確的定義，以後才將和項目有關的事和文編輯上去。面對無法以《爾雅》為出發點的新知識，則儘量以地方志所載的文字為基礎，敘述項目的形狀、功能，以及其在當地社會中的作用。相較於以《爾雅》為首的記載方法，後一種方式則少有「志異」的敘述方式，記載上較近於真實。以後的私修類書，在體例上雖然有沿習《御覽》傳統的影子，但礙於科舉考試的現實需求，草木花果、蟲魚鳥獸等的記載若不是被視為知識之末流，就是被視作娛樂之作而不被重視。所有的類書，唯一能被犧牲而不列為類書當之一門者，唯有記載日用器物或自然界之動植物的類門而已。

到了南宋末年，以科舉為高的知識體系，開始有了轉變，「理學」的勝利居功厥偉。寶祐年間出版的二部類書紛紛應用「格物」的概念來編寫他們的類書，尤其是在敘述自然界的動植物方面。朱熹對《大學》中「格



物」一詞的新解，原來是要在自然界的萬事萬物中發現「理」，進而提升個人的道德修養。這樣一來，免不了要對所見所及之事物做一個實事求是的描寫。無心插柳，一種研究自然界的新方式就由此而生了。用「格物」的概念所作的自然界描述，和《御覽》的傳統，給予事項明確定義的方式雖然有點相似，但是，運用「格物」所編寫的類書，在自然事物的名稱、形狀、來源和變化的描述方面，顯然比《御覽》的體系更加仔細和完備。

不只是在醫學或自然學方面，耶穌會士傳進中國的知識，都被以「格物」的概念納入中國的知識體系裡，「格物」明顯地是明朝最重要的知識認識方法。宋代的士大夫拋開中古時代的知識傳統，考量本身的需要，重塑其知識體系。到「格物」被應用在對自然界的觀察時，可以說是士大夫知識文化發展的高峰。南宋末年對自然界的「格物」，或許仍沒有達到田野觀察的地步，甚或停留在紙上談兵的階段，但是明代用「格物」的概念來收編知識、討論知識，該可以上溯到南宋。





## 參考書目

1. 不著撰人，《群書會元截江網》，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 不著撰人，《錦繡萬花谷》，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嘉靖十五年(1536)序錫山秦汧鑄石書堂刊本。
3. (宋)吳淑，《事類賦》，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4. (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覽》，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全五冊。
5. (宋)林駟、黃履翁撰，《古今源流至論》，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6. (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57，全八冊。
7. (宋)晁公武撰，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全二冊。
8. (宋)祝穆，《古今事文類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9. (宋)袁采，《袁氏世範》〔叢書集成新編本〕，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10. (宋)高承(明正統十二年(1447)刊本不著撰人)，《事物紀原集類》，臺北：新興書局，1976。
11. (元)脫脫，《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標校本。
12. (宋)陳傅良等，《八面鋒》，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3. (宋)陳景沂，《全芳備祖》，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4. (宋)章如愚，《群書考索》，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2，全二冊。
15. (唐)歐陽詢，《藝文類聚》，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嘉靖中(1522-1567)天水胡纘宗刊本。
16. (宋)潘自牧，《記纂淵海》，北京：中華書局，1988，全四冊。
17. (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



全八冊。

18. (宋)謝維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9. (宋)魏天應 編，《論學繩尺》，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0. 仁井田陞，〈元明時代の村の規約と小作證書など一日用百科全書の類二十種の中から一〉收入《中國法制史研究(補訂)》，3(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1)，741-829。
21.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臺北：允晨文化，2003，全二冊。
22. 吳蕙芳，《明清以來民間生活知識的建構與傳遞》，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7。
23. 吳蕙芳，《萬寶全書：明清時期的民間生活實錄》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1。
24. 彼得·柏克(Peter Burke) 著，賈士衡 譯，《知識社會史：從古騰堡到狄德羅(A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 From Gutenberg to Diderot)》，臺北：麥田出版，2003。
25. 胡道靜，《中國古代的類書》，北京：中華書局，2005。
26. 酒井忠夫，〈序言——日用類書と仁井田陞博士〉，收入酒井忠夫、坂出祥伸(編)，《中國日用類書集成》，1(東京：汲古書院，1999)，1-6。
27. 酒井忠夫，〈明代の日用類書と庶民教育〉，收入林友春 編，《近世中國教育史研究》(東京：國土社，1958)，25-154。
28. 張圍東，《宋代類書之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工作坊，2005。
29. 賈志揚(John Chaffee)，《宋代科舉》，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
30. De Weerdt, Hilde. "The Encyclopedia as Textbook: Selling Private Chinese Encyclopedias in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in *Qu'étais-ce Qu'écrire une Encyclopedie en Chin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 Vincennes, 2007), 77-102.
- De Weerdt, Hilde. *Competition over Content: Negotiating Standards for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Imperial China(1127-1279)*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31. Elman, Benjamin. "Collecting and Classifying: Ming Dynasty Compendia and Encyclopedias (*Leishu*)," in *Qu'étais-ce Qu'écrire une Encyclopedie en Chin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Vincennes, 2007), 131-158.
- Elman, Benjamin. *On Their Own Terms: Science in China, 1550-190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32. Fu, Daiwie. "A Contextual and Taxonomic Study of the "Divine Marvels" and "Strange Occurrences" in the *Mengxi bitan*," *Chinese Science* 11(1993-94): 3-35.
33. Kurz, Johannes L.. "The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the *Taiping yulan* and the *Cefu yuangui*," in *Qu'étais-ce Qu'écrire une Encyclopedie en Chin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Vincennes, 2007), 39-76.
34. Obringer, Frédéric. trans. by Janet Lloyd, "A Song Innovation in Pharmacotherapy: Some Remarks on the Use of White Arsenic and flowers of Arsenic," in Elisabeth Hsu, ed., *Innovation in Chinese Medicin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92-213.
35. Sakai, Tadao. "Confucianism and Popular Educational Works," in Wm. Theodore de Bary, ed., *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 331-366.
36. Wei, Shang. "*Jin Ping Mei* and Late Ming Print Culture," in Zeitlin,



Judith T. and Liu, Lydia He, eds., *Writing and Materiality in China: Essays in Honor of Patrick Hana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The Transformation about Description of Plants in Encyclopaedias (Leishu) during the Sung Dynasty

Cheng-chih Yao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o discuss the description of plants in *Imperial Digest* (*Taiping yulan* 太平御覽), *Records of the Origins of Things* (*Shiwu jiyuan* 事物紀原), *Valley of Splendid Flowers* (*Jinxu wanhuagu* 錦繡萬花谷), *Composition of the Important Events from Ancient to Present* (*Gujin hebi shilei beiyao*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 and *Flower Origins* (*Quanfang beizu ji* 全芳備祖集) are the purposes of the article. They were made separately in Northern Sung and Southern Sung Dynasty. Chinese encyclopedias (*Leishu*) come from early dynasty, but either numbers or functions which both were more prosperous than before and made a turning point during the Sung dynasty and developed a new classed systems of knowledge. After *Imperial Digest* (*Taiping yulan* 太平御覽), *Extensive Records of the Reign of Great Tranquillity* (*Taiping guangji* 太平廣記), *Models from the Archives* (*Cefu yuangu* 冊府元龜) and *Finest Flowers of the Preserve of Letters* (*Wenyuan yinghua* 文苑英華) were compiled completely, the Sung court stopped compiling some things like those, and the elites took the place of the court. Beside edited for civil examination, the encyclopedias which the elites compiled also embraced the ideas of the time. Generally speaking, the encyclopedias in early Sung dynasty molded on *Imperial Digest* to take down the natural objects including the



plants. By the end of the Southern Sung dynasty, the details of contents have been transformed. Because of the success of the Neo- Confucianism ( *li xue* 理學) produced much effects on the edition of encyclopedias. Zhu Xi gave the term – research into things ( *Ge wu* 格物)-new meanings which he wished people will discover the principle by researched into the natural objects and events and promote their moral-cultivated then. The compilers applied the method of research into things to describe the plants including their names, shapes, origins and changes. By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y, the intellectuals were used to use the term - *Ge wu* – to interpret the knowledge. It became a tradition in Ming and Ching dynasty.

**Keywords:** encyclopedia ( *Leishu* ), plants, Neo- Confucianism ( *li xue* ), research into things ( *Ge wu* ), civil examination, knowledge

